

宰制万物

——来自帝国与第三世界的两种现代时间观 及全球秩序想象

殷之光

[内容摘要] 帝国是具有全球规模的霸权。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其特征是对现代空间及其秩序的趋同想象，以及对现代时间的规训。在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史叙事传统整合与影响下的“现代”史叙述中，不但完成了对“东方”的“他者化”改造，同样也塑造了一个本质化的“西方”神话。用“先进”与“落后”对不同“文明”进行框定，并进一步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类“整体历史”的发展进化轨迹。而二战后，包括新中国在内的许多新独立的亚非国家，都在 1950 年代开始对自身历史主体性与旧帝国秩序进行了理论性思考与实践。在此历史背景下，第三世界在“国际主义”的合作与互助基础上，构想了另一种全球规模的秩序。在这种秩序想象中，独立民族的兴亡并不必然遵循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准则。它更体现了互助与创化的组织原则与目的论理想。这种秩序想象，更体现在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民族史、现代史书写中。中国的近代史分期讨论便应当被置于这一语境下理解。这一讨论中对“民族史”的强调，是对被压迫者主体性地位的探寻，并确立被压迫者在人类普遍主义历史中应有的平等地位。同时，随着亚非国家在社会历史变革与重新认识自身“民族”传统的互动中，去殖民历史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种建立在作为独立主体的“民族/国家”与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的共同命运基础之上的，互助的世界秩序想象，对西方中心的现代史书写进行了祛魅。这种非西方中心的世界图景想象也将对未来的全球化产生影响。

[关键词] 世界图景；趋同想象；互助想象；中国现代史分期讨论；亚非独立运动

一、导言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应当还不会否认，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正在向着一个日趋“全球化”的未来“前进”。一般认为，这一开始于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群体、社会、国家与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方面出现的相互依存，甚至趋同的倾向。^① 无论是全球化后来的批判者还是初期的狂热支持者们都不会否认，“柏林墙倒塌”是引发这一“全球化”现象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而刺激西方历史学者、特别是“全球史/帝国史”学者

^① 本文使用的“全球化”采用了 Lowe 的定义，见 Lisa Lowe, “Globalization,” in Bruce Burgett and Glenn Hendler eds., *Keywords for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NYU Press, 2014, p. 119.

对此现象进行大规模讨论的则是 2001 年的“9·11”事件，此后，愈来愈多的人开始相信，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迅速形成。^① 一度销声匿迹的“帝国”也作为一种——甚至是唯一一种——具有全球规模的霸权重新回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在一种强烈的胜利主义狂热浪潮中，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开始扮演起了时代先知的角色，用一种庸俗化了的黑格尔式目的论语言，宣判了历史的“终结”，并在公共媒体上为未曾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书写“历史”，试图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作为一种“思想钢印”，囚禁人们对于世界秩序未来的想象。^②

同样在 20 世纪末，一股对“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兴趣也迅速在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间兴起并获得巨大影响。^③ 其中，诸如 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以及 C. A. 贝利（C. A. Bayly）等一批在帝国史学术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则更是最早积极为“全球化”著史的一群欧美知识分子。^④ 对历史“全球维度”的“发现”大致与西方世界对“全球化”现象的热情同步。正如 19 世纪晚期英国的帝国史学者们一样，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秩序想象的中心也围绕着“中心—边缘”这一二元关系展开。在这种秩序想象中，全球的地理与政治空间被简化为由超大型国际都市（cosmopolitan city）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经由供应链与信息节点组成的网络。这一由成本与效益驱动的网络尽可能地追求效率、减少成本，并在超大型国际都市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其内部的中小型节点）之间构成一种“准时制”（just-in-time）的紧平衡。在这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图景中，真正拥有“主体身份”的中心是诸如“纽约”“伦敦”“香港”“东京”“巴黎”这些少数的超大型国际都市。它们的规模建立在全球各地向其输血，以及大量人员流动的基础上。它们不仅仅在现实中不断吸取“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智力与经济资源，更剥夺了人们的世界想象。在一个个“南方的纽约”“东方巴黎”“小伦敦”的文化幻景中，“世界其他地区”放弃了对自身主体性的探求，并逐渐将自身的命运同一种本质上无法持续，且无力对应全球性危机的秩序捆绑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世界想象追溯至 19 世纪。自西方殖民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展开以来，在西方之外出现了许许多多被冠以“东方巴黎”之名的城市。诸如阿塞拜疆的巴库、黎巴嫩的贝鲁特、伊朗的伊斯法罕、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印度的斋浦尔和朋迪榭里、柬埔寨的金边、菲律宾的马尼拉、越南的西贡，还有最为国人熟悉的上海。这类自我东方化的想象开始于 19 世纪殖民全球化的贸易扩张进程中。这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巴黎”与“伦敦”，无一不是殖民贸易的关键节点，其“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也大多充满着强烈的半殖民性。

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对现代空间及其秩序的趋同想象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对现代时间规训的产物。在中国，1980 年代初提出的“现代化史观”，及其对中国“革命史观”的批判便向我们展现了这种规训的力量。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1950 年代的历史分期法，特别是其背后

^① A. G. Hopkins,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 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in 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imlico, 2002, p. 1; Bruce Mazlish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13.

^② 在公共媒体上最为出名的例子之一便是《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2005 年出版的那本《世界是平的》。该书的副标题“二十一世纪简史”更能显示出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想象的胜利主义傲慢态度。在一个世纪的开头，便信誓旦旦地写下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③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

^④ 例如：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A. G. Hopkins, ed., *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2004.

所体现的历史观在遭到了一番批判之后，被作为过时的“革命史范式”彻底抛弃。^①而实际上，第三世界在“国际主义”的合作与互助基础上，构想了另一种全球规模的秩序。在这种秩序想象中，独立民族的兴亡并不必然遵循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准则。它更体现了互助与创化的组织原则与目的论理想。这种秩序想象，更体现在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民族史、现代史书写中。本文希望将这一遭到了系统性遗忘的讨论重新拿出来，并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亚非独立运动的语境下理解，展现其论争对象，及其背后复杂的价值观追求与世界图景想象。本文将以1950年代中国的近代史分期讨论为起点，希望将这场对于“现代”问题的讨论重新放回到其发生的历史现场，展现1950年代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提出时所直面的思想论争对象，并尝试将“现代史”书写进行一次再“祛魅”。本文强调，这场从来被视为中国“内部”的、受中国政治环境所“左右”的讨论，实际上与1950年代开始的那场全球性的亚非独立运动，特别是这场运动中文化去殖民的诉求密切呼应。在这场影响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与国家的大潮中，民族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互助”是这时期亚非国家与西方世界内部被压迫民族对新世界秩序想象的重要基础。

二、“现代”时间及其统治

1954年2月，在《历史研究》的创刊号上，开篇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文中抛出了“为什么要进行分期”与“为什么要这样分期”这两个核心历史观问题。^②文中，胡绳遵循毛泽东在1930年代做出的判断，即在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中国“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③由此，将1840年视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④此文发表之后，关于中国近代史从何时开始写起，又应当分为几个阶段的问题，陆续吸引了包括孙守任、范文澜、金冲及、戴逸、李新、荣孟源、王仁忱、章开沅、黎澍、来新夏等诸多重要近现代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⑤按照胡绳的意见，提出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为了“解决”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的“结构问题”，并提供一条线索，“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联起来”。在这一问题意识基础上，胡绳认为单纯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态”作为中国现代史分期的标准是不妥当的。我们还应当注意“中国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⑥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将这场讨论视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学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照执政党的意愿，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来规训历史学科的结果。^⑦德里克在这个

① 王也扬、赵庆云：《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页。

②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15页。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7卷）》（第2版），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99页。

④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第15页。

⑤ 关于这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主要观点及核心问题，参见来新夏：《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第123—128页。

⑥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第7—8页。

⑦ 例如：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刘林海：《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08—121页。不同的是，陈怀宇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将这场历史分期的讨论放在了更大的国际史学交流的范畴内去讨论，从国际文化互动的角度，呈现了这场讨论的一个不同面向。参见：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文史哲》，2017年第1期，第41—69页。

问题上做了更细致的讨论，他将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并采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理解并重述中国历史脉络的进程，视为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渐进过程。而1950年代的这场讨论，也是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①今天，鲜有论者再乐意从学术层面上重视这场1950年代的讨论。究其原因，当然也与学界审视这场讨论时的认识论密切相关。这场在史学界出现的讨论，以今天专业主义的视角来看，一般被认为是一场围绕着“史观”而展开的技术性讨论。由于“史观”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且随着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因此，中国历史书写也面临着“范式”的转变。从“革命史”走向了“现代化史”。^②这一范式的变迁也同样伴随着一场1980年代初出现的对“历史分期”的讨论。不少参与这场讨论的历史学者也同样参与了1950年代那次讨论。在1980年代的这场讨论中，用“现代化”取代“革命”的态度非常明确。在一种线性的认识逻辑下，有论者强调，那种用“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期方法书写中国现代史的做法，已经落后并急需被“淘汰”。^③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全盘拥抱1980年代在美国社会科学学界重新兴起的“现代化史观”。这种史观对之前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做出了实用主义的诠释，强调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是线性的，不断追寻物质繁荣、技术进步的过程。

198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史观”讨论，将“现代化”等同于一种“新”的、具有“普适性”的历史书写原则。强调应当摆脱“旧”的革命史观中过分注重“政治史”而忽视“文化史”的“错误”。^④强调应当反思“革命叙事”中，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反帝反封建”叙史脉络，将“民族史”放在一个“世界史”的大框架中去理解。^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在这种线性“现代化史观”中是衡量进步的最重要指标，因此，在主张用现代化史观来重写中国现代史，并将其与世界史连接起来的尝试中，绝大多数都将世界缩减为一个充满着西方中心色彩的地理与认识空间。其中仅仅包含了西欧、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⑥这种“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的更替背后，更呈现了1980年代后历史观自我重构过程中历史哲学的根本变化。一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迅速替代了革命史观中的辩证法。与“现代”相关的即是新的、先进的、普适的、客观中立的，且与世界“接轨”的。而反之，“革命”历史书写则是旧的、落后的、特殊的、被“政治化”，且逆“全球化”的。^⑦同时，在这种“现代化史观”的自我建构过程中，革命史观还被认为是具有强烈目的论导向的“宏大叙事”。言下之意，描述现代化史观通过描述“历史细部环节”的手法，采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则有效地克服了“宏大叙事”影响下，有导向性地“编织”史料

① Arif Dirlik, *Culture and History of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40—50页。本文梳理了这种“范式”转化讨论出现与发展的学术史历程。

③ 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50—61页。

④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胡绳在提出历史分期问题的同时，恰恰是批判了过去“纪事本末体”中“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而缺乏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参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第7页。实际上，不少参与了1980年代“重写”中国史讨论的历史学家，本身也是1950年代历史分期讨论的亲历者。这种对1950年代的“反思”，究竟包含了多少重写与再造，似乎并未有人关注。

⑤ 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35—49页。

⑥ 例如：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35—49页。

⑦ 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82—90页。

这一严重错误，进而“还原历史真相”。^①

这场对于现代史分期的争论，隐藏了一个“现代”与“现代化”观念的语义转变，更由此表现出了人们对于赖以存在的时空的争夺。20世纪晚期英语世界的人文地理学家们注意到，时间与空间作为两个相互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场域，在“现代意识”（modern consciousness）的自我构成中各自扮演了重要作用。这类讨论勾画了这样一个场景：19世纪之前，人类对具有独特性的“自我”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想象，主要围绕着“空间”（space）展开。而19世纪的重要变迁是“时间”逐渐取代了“空间”，成为这种“现代意识”构成的核心场域。^②

的确，当我们站在欧洲中心的视角上，这种全球秩序观从“空间”向“时间”的转变毋庸置疑。作为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驱动者，欧洲——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想象打破了地理空间的局限，蔓延至全球。伴随着这种政治与经济权力扩张的是英语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完成。这一普世史对世界的规训建立在两个重要基础上。第一，是以种族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论；第二，是目的论的线性史观。^③在这两个原则的驱动下，以空间为基础的、平面的人类权力秩序关系被重写，成为一种在线性时间上书写的“发展程度”的差异。

这种目的论的历史书写，将时间转变为统治工具。用“先进”与“落后”对不同“文明”进行框定，并进一步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类“整体历史”的发展进化轨迹。虽然在空间上，人类的不同“种群”居于相互并无巨大差异的地理区域，然而，由于“发展程度”的区别，这种人类空间上的共存关系便被置于次位，取而代之的是在线性时间坐标上的先后次序。在这个新的坐标上，人被从时间上划分成了自然史意义上的“种群”。人类被撕扯为“文明”与“原始”种群之间的主奴关系。“落后”的种群——一切有色人种——不得不面对，甚至应当主动接受那些在时间性的文明进化轨迹上居于最前端的种群——拥有白色皮肤的“高加索人”——的“治理”与“启蒙”。^④在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话叙述中，这种“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演变成为“雇佣”与“被雇佣”、“资本/智力”与“劳力”、“发达”与“欠发达”的关系。种族主义者为世界建立的从属秩序，就此通过这一时间的坐标线谋取了它“普遍性”（universality）的前提。

我们还能发现，在19世纪帝国史的叙述中，这种文明论的目的论判定，还反过来宰制了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从早期诸如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约翰·罗伯特·希里（John Robert Seeley）等帝国主义者的讨论中，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自然环境、地理特性等客观条件，都会被用来佐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是“英格兰”人得以向全世界扩张的必然

① 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82—90页。

② Barney Warf and Santa Arias, eds.,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Vol. 2009,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2. 关于地理空间与时间认识在政治主体性构造与全球秩序构成中的作用，本文得益于与章永乐的讨论。在这种新的时空秩序构造中如何理解中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现代化”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中凸显的西方之外的“现代”意义，本文得益于：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1—54页；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薄弱环节的革命与二十世纪的诞生》，《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第78—103页；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第56—78页。

③ 关于19世纪英国帝国史学者的目的论史观，以及这种辉格史观对世界“整体史”的规训，参见：殷之光：《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第113—128页。

④ Peter Pels,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6, No. 1, 1997, pp. 163-183.

性与合理性。^①这类帝国主义扩张理论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神论的话语，强调气候、种族与道德观念及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气候不仅为种族构成打上了明确的心理烙印，更直接构成了民族的生理与道德特性。英语世界 19 世纪的现代地理学研究便基于这种信念。^②同样，在广大西方之外的 19 世纪知识分子中间，我们也能发现这种殖民的时间观对他们各自地理空间认识的宰制。^③

中国 1980 年代“现代化历史观”所体现的恰恰是对上述这种时间观念的服从。同时，在 1960 年代，这种现代化的时间观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经由一批在肯尼迪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科学家之手，获得了新的“科学”工具的加持，蔓延至了经济组织、政治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等多层面，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普遍的”坐标体系。^④这种坐标体系沿袭了 19 世纪的殖民普世话语，强调“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截然对立的关系，突出“传统”朝向“现代”国家的“发展”，遵循一条唯一的直线路径，且这种转变必须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演进，而这一演进过程，可以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更多的是向发达社会学习——而得到显著加速。^⑤

西方中心的“现代意识”其“普遍性”的获得既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倒叙。在殖民地中，西方中心的“现代意识”被无处不在的殖民机构强化，系统地规训着殖民地经济、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那种抽象的“先进”与“落后”的自我认识，伴随着具体的殖民与被殖民的权力关系，成为被殖民者身体与思想上都难于摆脱的枷锁。被殖民者的服从，反过来又确证了殖民现代化论述中那种建立在线性现代时间观之上的认识论与世界想象。真正打破这种自我确证式预言的力量，来自殖民与被殖民的中间地带，来自殖民世界观的认识论边缘，来自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这些曾经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地带，为我们理解西方中心“现代意识”普遍性的形成提供了绝佳的空间，也为我们想象不同的“现代意识”及其世界秩序提供了必要的现实资源。^⑥

三、“民族史”的亚非时间

围绕着 1950 年代历史分期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分期标准”问题。胡绳认为，依照“帝国主

① 参见：殷之光：《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第 113—128 页。关于帝国用文明论来规训地理认识的分析，参见：Robin A. Butlin, *Geographies of Empire, European Empires and Colonies C. 188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0-395.

② 参见：D. Livingstone, “Climate’s Moral Economy: Science, Race and Place in Post-Darwinian British and American Geography,” in A. Godlewska and Neil Smith eds., *Geography and Empire*, London: Blackwell, 1994, p. 140.

③ 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 年第 4 期，第 11—54 页。

④ 普林斯顿大学的 C. E. 布莱克（C. E. Black）对现代化的定义很能体现这种 19 世纪殖民帝国主义中形成的“现代化”观念，在 1960 年代被新的“科学”装裱，并重新强化了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先进”对“落后”的宰制关系。他认为，现代化是“历史上演化而来的诸项制度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各种功能的过程，这些功能反映了人类知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加，使人类得以控制自己的环境。”参见：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p. 7.

⑤ Jeffrey C. Alexander, “Modern, Anti, Post, and Neo: How Social Theories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New Problems of Our Times,”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Vol. 23, No. 3, 1994, pp. 165-197. 关于 1960 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其政策影响，以及这种现代化观念与 19 世纪殖民主义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之间的深层联系，参见：〔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版。

⑥ 在英语世界中，最早从全球史角度对半殖民地的历史与社会政治意义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应当从“半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理解 19—20 世纪帝国主义全球秩序构成的，参见：Jürgen Osterhammel,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p. 290-314.

义的侵略的形态”这种外在因素来梳理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忽略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忽略“对侵略的反应”的视角，正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重要缺点。在参照了苏联历史分期讨论的结论之后，胡绳将“阶级斗争的表现”视为中国近代历史划分的标志。在随后的商榷文章中，孙守任又进一步认为，应当将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渡性”社会形态作为大背景来讨论。并进而提出，胡绳用“阶级斗争”高潮与低潮的标准来划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仍旧有可能存在教条的僵化色彩。因此，孙认为，应当用更为辩证的“矛盾形式”与“矛盾关系”作为历史叙事的主线，并展现中国社会内部在各种复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出的变迁及这类变迁的内在动力。^①随后的讨论便主要围绕着两人的观点展开。

在后续的讨论中，无论是坚持用革命高潮分期，还是强调以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分期，都能看到参与讨论的学者们共享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即需要在“帝国主义”势力这一全球性的秩序与权力背景下，寻找并强调作为“弱小国家”的中国的历史主体性地位。而这一点，恰恰与当时战后亚非独立运动浪潮中，反对殖民种族主义下的“文化压迫”，并通过“文化合作”来重新“记述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这一普遍诉求相契合。^②这种互助的世界秩序想象，建立在作为独立主体的“民族/国家”与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的共同命运基础之上。事实上，如果离开了这一重要背景，便无法真正理解这场讨论中对“民族史”的强调，在20世纪中期亚非独立运动，以及重构世界战后新秩序进程中的重要政治价值，也无法理解“民族史”这一观念，在20世纪全球去殖民的思想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场讨论从1954年开始，一直延续至1960年代。在这段被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称作“万隆时代”的时期里，新独立与尚未完全独立的亚非国家正在积极组织并推动文化、政治与经济事务等多方面的跨国合作。^③这种合作的前提是因为殖民主义在其附属地压制了“人民研究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基本权利”，进而妨碍了“本地区的文化进步，并阻碍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合作”。因此，亚非国家的真正解放，不仅仅需要完成政治的独立，更需要完成文化的解放。这便需要被压迫者之间互助式的“文化合作”。这种合作能够促使被压迫人民发现并发展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基本人权”，也具有促进前殖民“附属地人民”“个性的发展”的价值。同时，这种对民族文化的伸张并不抱有“排外或者同其他国家集团及其他文明和文化相敌对”的观念”。相反，更希望在“更大的世界合作的范围内”继续发展亚非之间的文化合作。^④很快，万隆会议中提出的文化合作号召便在1957年于开罗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得到了具体的回应。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有关文化合作的决议，涉及互设奖学金、语言教学、文学翻译、文化艺术交流、教科书编写、设立亚洲问题研究的国际大学、扫盲、电影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

在《关于文化合作的决议》中，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提议，通过亚非间互助，达成亚非各个成员国的民族独立，并真正将亚非人民的“灵魂解放出来”。决议强调，这种互助的客观条件在于

^①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22页。

^② 《关于文化合作的决议》，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36—240页。

^③ Samir Amin, *Re-Reading the Postwar Period: An Intellectual Itinera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4, pp. 14-15.

^④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9182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4月23日。

亚非国家共同的被殖民经历使得这些国家中“民族文化”遭到“殖民主义”的压抑。这种殖民主义“文化压迫”的手段，令大多数亚非国家缺少能够支撑新生国家的知识与文化力量。因此，决议鼓励“较先进的亚非国家在教育、技术及科学机构方面提供便利”，以帮助接收其他无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工作的亚非国家的学生。这种互助合作还进一步涉及了民族主体性建构这一“灵魂解放”最终任务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达成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则是通过“编著一部历史和地理百科全书式的书，来记述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解释每一个民族对它的民族文化的贡献以及在进行它的民族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还强调，这部百科全书应当遵循联合国的原则，以“加强人类中间的血亲关系”为目的。^①

在这一大背景下，1950年代中国历史分期讨论中对“民族史”的强调，不能被理解为19世纪兰克式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而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下，对被压迫者主体性地位的探寻，并确立被压迫者在人类普遍主义历史中应有的平等地位。这一点是1950年代诸多来自亚非世界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追求。在这里，我们值得提一下非洲历史的伊巴丹学派（Ibadan School）。这批以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雅各布·F. A. 阿加以（Jacob F. A. Ajayi）为代表的非洲历史学家，活跃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他们强调，书写非洲历史应当脱离“欧洲扩张”的框架，树立自身的主体性。非洲史不能作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而应当成为独立的一个研究门类。^②从其叙史目的来说，阿加以所倡导的非洲史绝非是简单的、与世界割裂的非洲国家“民族史”。这一点，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阿加以参与写作的《非洲通史》序言中便有着明确的表述。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非洲通史》的编写计划开始于1964年，迄今出版了八卷。在总序中，主编J. 基-泽博（J. Ki-Zerbo）开宗明义，宣言一般地写下“非洲拥有历史”。^③在他看来，非洲的历史“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也是一部觉醒的历史”。因此，对非洲历史的书写需要对过去欧洲叙述下的非洲进行祛魅。对非洲历史的重写，一方面是要书写属于非洲自身的历史，另一方面，也需要强调，这一历史写作不能脱离几百年来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政治、经济与知识活动。^④《非洲通史》的编写者们触及了近现代历史叙事中更深层次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需要从“内部角度来对待非洲历史，而不能再沿用外国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这种历史叙事既不能“报复性地”彻底无视现代欧洲对非洲殖民的巨大影响，也不能走进那种“自我满足的”民族中心主义叙事。^⑤

对“非洲历史”的重写展现了一种在非西方国家内从1950年代开始兴起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宏大潮流。与之相呼应的是万隆会议最后宣言中对亚非世界“文化去殖民”的声张。包括新中国在内的许多新独立的亚非国家，都在1950年代开始对自身历史主体性与旧帝国秩序进行了理论性思考与实践。长久以来，研究者都更关心这种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中对“民

① 《关于文化合作的决议》，第236—237页。

② T. O. Ranger, ed.,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frican Historians Held at University College, Dar Es Salaam*, Portsmout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5, p. 194.

③ J. Ki-Zerbo,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 Methodology and African Prehistory*,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81, p. 1.

④ Ibid., pp. 1-3.

⑤ Ibid., p. 20.

族自决”以及“反殖民”的强烈主张，却很少看到，这一运动对亚非国家之间经济与文化“互助合作”给予的同等重视。而只有通过“互助”与“团结”，才能够确保弱小国家之间能够“集体地保卫他们的独立”，并在“一个战线上而不是在许多分散的战线上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①这也是20世纪中期参与到亚非团结运动中去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们的基本共识。

1950年代亚非知识分子对历史主体意识的追寻也同样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历史学者。当时不少新一代的左翼西方历史学家也开始认识到，他们所熟悉的世界/普遍历史的叙述中潜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意识。在1954年于杜伦举行的世界青年汉学家年会上，让·谢诺（Jean Chesneaux）便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评论，提出应当审视中国历史与普遍/世界史（l’histoire générale）之间的关系。他注意到，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都开始了一种相类似的社会历史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对殖民帝国霸权的回应，以及对自身“民族”传统的发现，并在这两股力量的互动中，呈现出了与欧洲历史截然不同的现代经验。让·谢诺强调，理解这种历史变革背后的逻辑，能够帮助欧洲历史学家超越自身“欧洲中心主义”（l’européocentrisme）的局限。^②让·谢诺也注意到了当时在中国刚刚开始的中国历史分期讨论。这也是这场讨论第一次进入西方历史学家的视野。^③一年之后，在荷兰莱顿举行的世界青年汉学家年会第一次邀请了周一良与翦伯赞这两位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会上，周一良也专门介绍了中国的亚洲历史研究，并格外强调了反帝与反殖民斗争经验对亚洲人民自我历史认识的重要影响。^④

无论是在周一良对欧洲汉学家做的介绍中，还是在胡绳最初开启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文章中，我们都很容易注意到，确立殖民与半殖民地现代经验的核心，是在反帝反殖民过程中“人民”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形成。这一命题，最早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出现。^⑤人民在这里并不是一种名义上的集体名词，而是代表着一种具有主体意识的集合。人民具有决定历史发展轨迹，并且“建立国际和平”“保障国内和平”的能力。^⑥作为自觉的主体，“人民”有塑造战后新的国内与国际秩序的能力。其主体意识来自不懈的反侵略、反帝，以及反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一斗争，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强弱之争，将“进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论叙述，转变为争取自由、反对压迫的道德观念。与之相对的，不再是线性时间中的“落后”，而是具有革命道德意义的“反动”。在之后1980年代“现代化史观”的视角中，这种革命叙事中对神圣性的道德追求几乎成为革命史观不“客观”、不“理性”的原罪。然而，如果我们回到19世纪殖民主义现代化叙事的诞生时刻，便会发现，这种用“科学”与“客观”包裹的普遍主义叙事，其源起则与殖民主义对自身合法性道德建构密不可分。

① [埃及] 哈立德·毛希丁：《关于帝国主义的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33—34页。

② Jean Chesneaux, “L’histoire De La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Programme D’études Et D’interprétation,”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10, No. 1, 1955, pp. 95-98.

③ 关于这场讨论在欧洲历史学家中间的传播，参见：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第41—69页。

④ Gi-Wook Shin and Daniel C. Sneider, eds.,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44-45.

⑤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7卷）》（第2版），第183—276页。

⑥ 同上。

四、以帝国规训“现代”

20世纪初形成的盎格鲁-撒克逊全球秩序叙事对“现代”及“现代化”进行了本质主义的规训。两者共同为19世纪西方以种族为核心的文明论秩序叙事披上了一层更为“理性”的外衣。在这一脉络中出现的“普世史”叙述，则更将这种源于欧洲历史的“现代”与“现代化”观描绘为一种人类的普遍秩序。需要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史叙事传统整合与影响下的“现代”史叙述，不但完成了对“东方”的“他者化”改造，同样也塑造了一个本质化的“西方”神话。而这一神话的基础，则来自辉格史学家们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中心创造出的世界秩序观。19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史学以及后殖民主义史学，都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具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的启蒙现代性叙述。然而，对于启蒙现代性叙事是如何塑造一个本质化的“欧洲”，并进而树立与“东方”相对的“西方”，却言之甚少。^①

盎格鲁-撒克逊保守主义传统中对“现代”的系统规训大约开始于20世纪初。这一规训也与帝国史的传统密不可分。就在剑桥里格斯现代史讲席教授约翰·罗伯特·希里（John Robert Seeley）发表他著名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之后13年，也是希里去世之后一年，他的继任者阿克顿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1st Baron Acton）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他试图编写一部世界通史。1896年，在阿克顿勋爵给剑桥出版社的计划书中，他写道：“现在的时机千载难逢，我们得以将19世纪赋予我们的全部知识系统记录下来……将国际研究最成熟的结论赋予世人。”^②在这里，阿克顿勋爵用了“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research）来表明他所希望处理的研究对象。早在1896年年初，剑桥出版社便开始着手准备编写一部“伟大的英语普世史”（English Universal History）。^③在同意担任这一项目的总编之后，阿克顿勋爵进一步阐释了他对“普世史”的理解。在他看来，“普世史”不是简单意义上“所有国别史的集合”，而需要有一条统一的历史分期脉络来统辖整体叙事。阿克顿勋爵选取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绝对君主、革命等关键事件来标记人类整体的历史进程。在他看来，只有在同这些事件发生关联了之后，“国别史”才能在这一整体叙事中获得一席之地。^④

阿克顿勋爵的目的是要在历史书写中寻找“意义”。这种意义的核心来自他选定的标记物，以及“地方史”（local history）与这些关键事件发生的联系。只有这样，这些碎片化的“地方史”才能获得“哲学上的统一”（philosophic unity）。也只有在获得了“统一”之后，历史才成为“历史”，而非单纯的“编年”（chronicle）。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阿克顿勋爵甚至表示，在他将要

^① 关于这个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卡罗拉·迪策（Carola Dietze）与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就后者“地方化欧洲”观念发生的争论。迪策的文章参见：Carola Dietze, “Toward a History on Equal Terms: A Discussion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7, No. 1, 2008, pp. 69-84. 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观念，具体参见：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他对迪策的回应，参见：“In Defense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A Response to Carola Dietz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7, No. 1, 2008, pp.85-96. 对于两者争论的具体分析，特别是查克拉巴蒂“地方化欧洲”观念的学术脉络梳理，参见：张旭鹏：《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概念》，《全球史评论》，2017年第2期，第34—49页。

^②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n Account of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7, pp.10-12. 爱德华·卡尔（E. H. Carr）在其著名的《何谓历史》中也引用了阿克顿勋爵的这番话。同样，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最后一卷的开头，讨论“近代史”界限的导言也以同样的话开头。

^③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n Account of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p. 6.

^④ *Ibid.*, pp. 7-8.

编写的现代史巨著中，“直到俄国成为了普遍史一个因素——即彼得大帝之后，（我的历史书写中）都不会有俄国的章节”。^①

与他的前任一样，阿克顿勋爵编写的《剑桥现代史》也试图描述一个发源于欧洲，并向世界其他角落扩张的人类“文明”历史。在阿克顿勋爵的设想中，这部“普世史”不应有注释，不应有非英语的引文，无须掉书袋，甚至也不需要循循善诱的讨论，而应当是“英美学者所能创作出的最完美的叙述”的集合。^②如果说希里用他的《英格兰的扩张》描绘了一部“出英格兰记”的神圣叙事，那么，阿克顿勋爵所构想的“普世史”便是一部“福音书”，也更像是一部启示录。

今天的研究者们能够轻易地指出阿克顿勋爵历史观中的强烈欧洲中心主义和目的论色彩。“旧版”的世界现代史开始于“地理大发现”，终结于19世纪末国际法秩序引领下和平、民主与科学秩序的全球散播。二战之后成书的《新编剑桥世界现代史》（以下简称《新编》），也明显意识到了“旧版”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转而对“文艺复兴”这一更具文明史色彩的事件作为现代史的开端。其结尾也并未像旧版那样充满乐观情绪，而是通过对二战末期美、苏、英外交史的叙述，佐证了战后国际间深层次分裂的必然性。《新编》成书于1957—1979年。其中除了彼得·伯克（Peter Burke）编写的第13卷（附卷）出版于1979年外，其余主体12卷都在1957—1968年编写并出版。全编反映出了笼罩在欧美世界的、浓厚的冷战阴云影响。另外，此时的英帝国秩序已然分崩离析，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诞生的新兴国家也此起彼伏。《新编》显然也有意识地对这一人类历史进程做了回应。在全编总序中，作者乔治·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Clark）承认，存在一些具有显著差异的“民族或民族集团”，无法被简单地归纳到一个人类“共同的历史过程”中。因此，就需要“专章或专节来加以叙述”。^③虽然，克拉克爵士表示，《新编》放弃了阿克顿勋爵在编写“旧版”时表达的野心，不再追求成为一部记录“人类全部知识”的整体历史，更未敢言明要以这部历史作为人类文明通向未来的“航海图与指南针”。^④但是，他也认为，《新编》也绝不是“各民族历史的汇编”，而是延续了旧版对人类历史进行整体性叙述的野心，去记录人类历史的变化。

我们发现，在《新编》出版的年代，英国的历史学家似乎已经远离了阿克顿整体史的信念。正如《新编》第12卷的编者C. L. 莫瓦特（C. L. Mowat）在该卷序言中所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仍然抱着阿克顿的信念，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⑤但是，从整部新编的历史分期与编排形式上，我们却仍旧能发现，欧洲仍旧占据这部人类“现代历史”叙述的主体地位。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类”现代历史，还是一部欧洲现代精神向全世界散播的历史。实际上，莫瓦特的序言仅仅承认，阿克顿那代英语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受到了目的论的影响。那种不加掩饰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目的论史观需要从历史叙事中被剔除。

^①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n Account of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p. 8.

^② Ibid., p. 9.

^③ 乔治·克拉克爵士：《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④ 乔治·克拉克爵士：《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第33页。

^⑤ C. L. 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1898—1945（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然而，“文明”观念本身与欧洲/西方历史根深蒂固的联系，却被保留下来，成为对人类文明“现代”与否的“科学”判定。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阿克顿对“普遍史”与对“现代”这一历史时间叙述中坚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问题，并未遭到《新编》的作者们的质疑。莫瓦特甚至举出《剑桥现代史》第12卷的例子，认为“那部著作绝没有用欧洲作为中心”，因为该卷的章节包括“埃及、苏丹、远东、英国的印度帝国、日本、拉丁美洲、欧洲殖民地的论述，并由一章专论科学时代”。^①

这个辩护显得极其无力。因为，作为一部“普遍史”，阿克顿从来也不曾表示他的叙述要将欧洲以外的地理世界排除在外。正如《剑桥现代史》第12卷开篇第一章首句话写的那样，人类的“现代”意味着“欧洲历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史”。在这一从16世纪开始的欧洲文明扩张的“现代”史叙事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欧洲”仅仅指的是“法国、荷兰、日耳曼、波希米亚、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格兰”。能否被囊括进“欧洲”的重要标准是制度。因此，“欧洲圈”的扩大是中心“欧洲”的殖民与武装战争的直接结果。在地理欧洲内部，“欧洲制度”先是从一个仅仅被欧洲大陆所接纳的体系，逐渐被诸如苏格兰、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等“外围国家”接受。由于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东南部欧洲包括匈牙利大部，则始终徘徊在“欧洲圈”之外，至于俄国则完全被排除。同时，15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为“欧洲文明”与“欧洲治理原则”的世界性扩张打下了基础。早期西班牙与葡萄牙对中美与南美洲大陆的殖民则被视为“欧洲影响扩张”的一种表现。18世纪末期独立后的美国及整个北美则更呈现出了“欧洲种族”相互融合，并在欧洲传统上继续发展出了新的形态。至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半独立社群”则随着其“政治逐渐地成熟”，而在19世纪成为欧洲“联邦”（Federal Union）的一分子。作者对于非洲与亚洲的基本态度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将“现代”描绘为一幅欧洲先进白人带领落后有色人种进入“政治成熟”与“自治”高级阶段的图景。^②

从今天的视角看过去，我们会下意识地将“现代史”与“帝国史”区别开来，仿佛“帝国”的历史仍旧受着其疆域的限制，而“现代”的历史则更具普遍性。然而，在《剑桥现代史》的编排与各卷序言中，我们不难看到两者的共通性，以及“现代史”所同样传递的强烈辉格史讯息。在希里的叙述里，英格兰的崛起是与其他欧洲大国竞争的结果。而英格兰的胜利则意味着它能够传承“西方文明”自希腊罗马以来的天命。希里并未花太多笔墨去描写这段“现代”之前的历史，而是直接从18世纪英格兰急速扩张的时代开始，去展现这一过程中英格兰对其他民族的“吸纳”能力。^③如果说希里在思考的是英格兰为何能在18世纪末继续“无限扩张”的问题，那么，阿克顿所推动的“现代史”，则更希望将“英格兰的扩张”这一问题，转变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全世界趋同演化的问题。虽然“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开始于法国大革命，但是通向这一现代开端的则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来自“欧洲”中心国家的诸多重要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剑桥现代史》在历史观上向读者们展现了一幅极具辉格色彩的宏大图景。连接这一从15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史叙事的主线是人类“文明”的趋同“演化”。越来越多的人

① C. L. 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1898—1945（第12卷）》，第2—3页。

② A. W. Ward, G. W. Prothero, and Stanley Leathes, eds.,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0, pp. 1-5.

③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4, p. 20.

开始“讲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观念来思考未来”。^①通过将希里所描写的英格兰在与其他欧洲“大国”竞争过程中崛起的历史，转写为几大欧洲国家共同向外扩张的故事，阿克顿的“现代史”建构起了一个“欧洲圈”及其文明在全世界获得普遍性的神话。至此，一个个原本具有强烈地方性色彩的、分裂的、分散在各个民族史内的事件，通过这一“普遍史”的叙述而融为一体。同时，随着20世纪末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者们的的工作，这种“现代”叙述重新回潮。其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描绘出的“现代化”与“发展”观念，也重新构成了被今天不少人接受的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秩序神话。

五、结语

今天，我们不少人对“现代”与“现代化”的认识似乎并未跳出19世纪殖民主义或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话语中那种胜利主义式的狂热。尽管21世纪初“全球化”的拥趸极力将自身所处的世界及其秩序想象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但是他们所勾勒的秩序，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这一集我看过”的印象。19世纪下半叶，在镇压了印度民族起义（The Indian Mutiny, 1857—1858）之后，英国作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正式形成，并快速步入其全球霸权的顶峰。在接下来的近50年里，英国通过电报、远洋运输、铁路及其军事机器，构建起了一个连接陆地与海洋的贸易网络。在这个世界性网络的构成过程中，并非仅有英国的身影。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也相继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的进步在这一时期极大地冲击了包括冶金、炼钢、化学等主要工业部门。内燃机的出现也彻底改革了动力工业。具有大量资金以及庞大产能的垄断性国际工业巨头开始在主要工业国家出现，并与国家力量相互勾连，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扩张。同时，这一以资本主义市场为动力的宏大变化，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开启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非但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人口迁移所跨越的空间越来越广、牵涉到的人口也越来越多；随着印刷工业和出版业的极速发展，以及基础教育的普及，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舆论开始进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诸多巨大变迁都表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②

在近些年对帝国问题的讨论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这种19世纪以来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帝国网络”（imperial network）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的作用。^③城市、贸易网络、群体、阶级、种族、性别等成为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重要单位。非但旧的农业帝国在民族主义觉醒时代岌岌可危，包括19世纪的英帝国在内，其全球扩张也导致被殖民地区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并就

^① A. W. Ward, G. W. Prothero, and Stanley Leathes, eds.,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p. 1.

^② [英] F.H.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③ 关于这一类讨论的代表性作品，参见：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Empires and the Reach of the Global 187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Gary Magee and Andrew Thompson, *Empire and Globalisation: Networks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in the British World, C. 185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mes Belich, *Replenishing the Earth: The Settl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nglo-World, 1783-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2004; Alan Lester, *Imperial Networks: Creating Ident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Africa and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1.

此埋下了帝国主义自我毁灭的种子。^①相应的，帝国在这个视角下也从安东尼·派格登（Anthony Pagden）所描述的“由一个种族或部落集团，用某种方式，统治其他种族或部落集团的超大型国家”^②，变成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跨越地理空间，通过贸易、通信、文化、交通网络建立起的身份认同与共同志趣。同时，在后殖民研究的影响下，旧的帝国史研究其合法性越发脆弱，到了近三十年，殖民史也从原先对英帝国制度与道德合法性的研究，转变为对“不列颠世界”（British world）的讨论。^③在这类殖民史书写下，帝国从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网络，蜕变为一种隐藏在“全球化”图景背后、不能被言明，乃至需要被彻底抛弃的底色。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帝国史研究彻底走向了帝国史初生时期的反面，成为反对帝国的历史书写，并由此悄然地完成了对帝国问题的去政治化。“帝国”与“帝国主义”也随之成为人们羞于提及的恶名。^④当今对“英语世界”（Anglophone world）、“法语世界”（Francophone world）的研究，便是这类回避帝国霸权而专心阐述“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有趣的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华文世界”（Sinophone world）研究旨趣，则呈现了“去殖民”研究的另一个面向。通过对全球化历史的书写，一方面消解了“中国”作为历史主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还对历史的中国进行了“有罪推定”，暗示中国与欧洲殖民国家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扩张历史。

然而，去政治化的去殖民研究考察，几乎彻底将霸权主义的政治与历史从帝国问题的讨论中剥离。在这种对物质全球化历史的关注中，资本与市场仿佛获得了独立意志，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则成为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论者们或者将“全球化时代”资本扩张的进程描述为一种市场经济从工业化的世界“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故事，或是向我们阐述一个多中心的、市场经济在全球各个文明区域萌芽的历史。^⑤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叙述这段历史，一个基本共识便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来源于“西方”的力量，不可逆转地完成了对“东方”的改造，并按照其逻辑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类叙述中，“西方”通过“资本”成就了其本体化的过程，成为潜藏在现代“世界”历史，特别是“现代化”历史叙事背后的模本。同时，这类论述还遵循了一个对人类未来发展走向的假设，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工与交换，创造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平等网络。这种网络不再有利于权威的树立，它重构了主权国家对“领土”的专属控制，改变了国际间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互动形式，它会天然地将人类导向自主与自由。^⑥然而，这种乐观主义态度似乎并未注意到，从19世纪至今，这种全球化变革的进程从未带来过真正意

①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 227-233; C. A.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don: Longman, 1989, pp. 235-247.

② Anthony Pagden, "Imperialism, Liberalism and the Quest for Perpetual Peace," in Stephen Howe ed.,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437-447.

③ 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综述，参见：Philip Buckner and R. Douglas Francis, eds., *Rediscovering the British World*,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05; Adele Perry, "Whose World Was British? Rethinking the 'British World' from an Edge of Empire," in Kate Darian-Smith, Patricia Grimshaw, and Stuart Macintyre eds., *Britishness Abroad: Transnational Movements and Imperial Culture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07, pp. 133-152.

④ 雷蒙·阿隆在1959年便将“帝国主义”一词称为“反对者与旁观者赐予大国外交的污名”。参见：Anthony Pagden, "Imperialism, Liberalism and the Quest for Perpetual Peace," p. 437.

⑤ 例如：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⑥ Saskia Sassen,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2.

义上持续、稳定的平等秩序。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大潮中，旧世界在危机面前的脆弱与荒谬，让其精心构造的“先进”与“落后”观念变得岌岌可危。全球化的流动神话，即便在旧世界的核心，也迅速让位于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与无奈的自怜自艾。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神话中被斥为保守与“落后”的“自给自足”观念，又被同一批虚伪的先知拿起来，将其换上种族主义的外衣，当作新的预言，放送给被疾病笼罩的人们。所幸，新世界从未停止过对旧神话的抗争。新冠元年之后，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她将是普通人与被压迫者的联合，她将无法被旧的价值坐标衡量，她将接续亚非灵魂解放的神圣愿望。

作者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人文学院全球中国中心主任